

西黃寺「班禪塔」形制探源—— 印度摩訶菩提寺建築的考古及 傳播

■ 張文玲

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羅桑巴丹益希 (blo-bzang-dpal-ldan-ye-shes, 1738-1780) 於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六月自後藏日喀則扎什倫布寺啟程，隔年 (1780) 七月抵達熱河避暑山莊，慶賀高宗七十壽辰。後至北京講經傳戒，駐錫西黃寺。兩個月後，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因病於西黃寺圓寂。乾隆派人造清淨化城塔，俗稱班禪塔，作為六世班禪大師的衣冠塔。雖然清淨化城塔的主塔造型為藏式佛塔，整個建築群中的紋飾與造像多為漢地佛教的造型風格，然而其總體結構則是源自印度菩提伽耶的摩訶菩提 (Mahābodhi) 寺，此形制在中國大多被稱為「金剛寶座塔」。本文擬依據十九世紀末的考古發掘、緬文銘刻、《大唐西域記》，並比對敦煌莫高窟北周 428 窟西壁所繪五塔，以及緬甸蒲甘王朝 Kyanzittha 王所建的阿難陀 (Ānanda) 寺，以理解印度摩訶菩提寺建築造型的意涵、沿革與傳播，並試探乾隆仿此形制來興建「班禪塔」的宗教考量。



圖1 | 1928年日軍侵華前的航拍黃寺建築群 2018年作者攝於西黃寺，月刊後製。

西黃寺的歷史背景與變革

清代北京的黃寺建築群由普靜禪林（東黃寺）、匯宗梵宇、清淨化城塔院、咨福院四部分組成。從 1928 年日軍侵華前的航拍黃寺建築群照片，這四部分依稀可見。（圖 1）東黃寺在西黃寺之東，與西黃寺一牆之隔，兩寺合稱「雙黃寺」。東黃寺原名「普淨禪林」，康熙三十三年（1694）重修此寺，為駐京高僧敏珠爾呼圖克圖的駐錫地，東黃寺今已無存。

位於北京黃寺大街的西黃寺，是清順治八年（1651），專為五世達賴阿旺羅桑嘉措進京，特於東黃寺旁，原遼金時期「匯宗梵宇」寺廟的基礎上，所興建的寺院。隔年（1652）西黃寺建成，十二月十六日達賴抵達北京，起初順治皇帝命其居於東黃寺，數日後移錫西黃寺，故該寺又稱為「達賴喇嘛廟」或「達賴廟」。寺院為兩層藏式長方形樓房，歇山寺房頂，全繫楠木建成，共 81 間，四周有回廊相通，巨柱分間，飛檐翹角，結構奇特。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世班禪羅桑貝丹益希（圖 2）來京祝賀清高宗七十大壽，亦奉命駐錫此地，是年年底感染天花，圓寂西黃寺，乾隆命於寺內建「清境化城塔」，安葬其衣冠經咒，以茲紀念。如今的西黃寺只是原來西黃寺建築群中的清淨化城塔塔院。¹

清淨化城塔——班禪塔的布局與結構

從布局上看，清淨化城塔建築群由塔前與塔後牌樓、護塔獸、五塔、東西兩側碑亭組成。整個清淨化城塔建築是漢、藏、印佛教建築藝術的結合：主塔的結構和形制是藏傳佛教覆鉢式佛塔，塔身高約 20 餘公尺，塔



圖2 | 清宮舊藏六世班禪宮裝像 2018年作者攝於西黃寺

身之上為塔剎，由鑲金銅蓮花座、相輪剎身和鑲金蓮花寶瓶剎頂組成，兩旁飾以望金垂耳。然而塔上的圖案紋飾、造型風格，例如：主塔基座、牌樓上的雲紋和鳳紋（圖 3）以及碑亭（圖 4），都是中國式的造型風格。然而從外觀上看，整個清淨化城塔的整體結構是採用印度菩提伽耶摩訶菩提寺的形制。五座塔建在漢白玉金剛寶座上，中央為主塔，四角各有一座小塔，塔身刻有漢文經咒，分別為《楞嚴大哈達喇呢咒》、《般若波羅密經》、《千手千眼無礙大悲心大哈達喇呢神章妙句》、《佛說藥師如來本願經》。² 寶座高約 3 公尺多，堅硬厚實，頗有金剛不壞之勢，四周設有漢白玉護欄，整塔高約 24.82 公尺。（圖 5）

主塔基座呈八角形，每角各有一位力士雕像。基座八面各雕有一幅佛傳故事圖，按



圖3 | 清淨化城塔牌樓 2018年作者攝於西黃寺

照右旋禮拜佛塔的方向，依序鋪陳佛傳故事：從面南正中第一幅「乘象入胎」到右行第二幅「佛誕」，第三幅「出四門」，第四幅「大出離」，第五幅「得正覺」，第六幅「初轉法輪」。接下來的第七幅浮雕，其構圖類似「降魔變」（圖6），即佛陀結跏趺坐，手結禪定印，左右兩側的魔眾持各式武器進行攻擊，而佛如如不動，安坐於寶座上。一般降魔變中的佛陀都是手結降魔觸地印，而非結禪定印。此外，按照佛傳的內容，「降魔圖」應該出現在開悟得正覺之前，而非在「初轉法輪」之後。因此，介於第六幅「初轉法輪」與第八幅的「涅槃與舉哀弟子」（圖7）圖之間的這幅，可能為「舍衛國神變」。



圖4 | 東碑亭 2018年作者攝於西黃寺



圖5 | 清淨化城塔 2018年作者攝於西黃寺



圖6 | 清淨化城塔主塔基座佛傳故事圖：降魔或舍衛國神變。 2018年作者攝於西黃寺



圖7 | 清淨化城塔主塔基座佛傳故事圖：涅槃與舉哀弟子。 2018年作者攝於西黃寺

印度菩提伽耶摩訶菩提寺的考古發現

南傳上座部與大乘佛教經典都明確記載佛陀在印度北部比哈爾邦（Bihar），尼連禪河（Nairāṅjanā，現名 Phalgu）岸邊，菩提伽耶（Bodh-Gaya）的一棵畢鉢羅樹（Pipal）（圖 8）下開悟得正覺，此樹後亦稱為菩提樹。菩提伽耶被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尊崇為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朝拜聖地，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佛教的搖籃。釋迦摩尼佛的證菩提，對人類的思想和信仰，具有重大意義。菩提樹歷經千古，見證了佛陀的開悟。

根據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śoka，其統治時期約為西元前 268 ~ 232）第八號石刻敕令的解讀，阿育王在他執政的第十年，約西元前 260 年造訪了菩提伽耶。³ 考古發掘證明，皈依佛教的阿育王在該地建造了第一座寺廟——摩訶菩提寺（Mahābodhi Temple）與金剛寶座，以及圍繞著菩提樹與金剛座的石垣，以此標記佛陀得正覺的地方。阿育王時期所建的石垣總計六十四根柱基，由此推測石垣長達 250 英呎。⁴

阿育王在菩提伽耶所建的第一所寺廟和金剛寶座的造型，以及菩提樹所在的位置，清晰地顯示於製作於約西元前 150 年，巽加王朝時期的 Bharhut 佛塔浮雕像上。（圖 9）浮雕紋飾上的多根柱子顯示：阿育王建造的菩提寺是一個以柱子支撐的開放性亭子，金剛寶座位於亭子的中央。寶座的正面有四根平整的壁柱，寶座的後方可見菩提樹的樹幹，樹幹兩旁有三寶及法輪組成的標誌，置於低矮的柱子上。寶座上鋪以花卉，而不見佛像。寶座的正上方，可見被石垣圍住的兩個支提寺（Chaitya）拱門，拱門之間有銘刻，內容為：「Bhagavato Saka-Munino Bodhi」，其意

指「尊貴、值得尊敬、完全開悟的釋迦牟尼的菩提樹」亦即「釋迦族聖人的菩提樹」。浮雕右邊可見一根以大象為柱頭紋飾的石柱，今已失傳。⁵

Bharhut 浮雕所示阿育王所建第一所摩訶菩提寺的可能樣貌，可透過以下的比對，獲得更進一步的推測。首先，浮雕上所刻的支提寺拱門造型，與印度阿姜塔石窟建於西元前二世紀第九窟入口的支提拱門造型（圖 10）相似；而其整體外觀或可從現存建於西元前二世紀，印度孟買附近的 Bhaja 支提窟（圖 11）得到具體的比對想像：浮雕上支撐亭子的柱子，或即類似 Bhaja 支提窟以及阿姜塔第九窟內部右旋禮拜佛塔甬道的柱子。（圖 12）Bharhut 浮雕所示，佛寺前方立一根石柱的建築形制，與建造於西元一至二世紀間，印度孟買附近的 Karla 第八窟支提窟相似，其入口左前方高聳著一根獅子柱頭的石柱。（圖 13）

印度考古調查局第一任局長，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坎寧安爵士（Sir Alexander Cunningham）1881 年在菩提伽耶大菩提寺內移除兩塊花崗岩面板後，發現了一件拋光的砂岩寶座。（圖 14）這是一塊厚實的拋光灰色砂岩板，長 7 英呎 10.5 英吋，寬 4 英呎 7.5 英吋，厚 6.25 英吋。整個頂部表面都雕刻有幾何圖案，四周雕飾華麗，裝飾以鴿子、常見的爵床花和鵝的紋飾造型。這被認為是最初由阿育王所造的金剛座，寶座的正面有四根平整的壁柱，如同 Bharhut 佛塔浮雕所刻劃的寶座樣式。所有的緬甸銘刻都指出，最早的摩訶菩提寺是阿育王所建造的，砂岩寶座代表著寺廟建築群的中心。⁶ 摩訶菩提寺千年以來，經歷了各種維修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改造在於金剛座由原先在寺廟之內，被移到



圖8 | 印度菩提伽耶的菩提樹 2004年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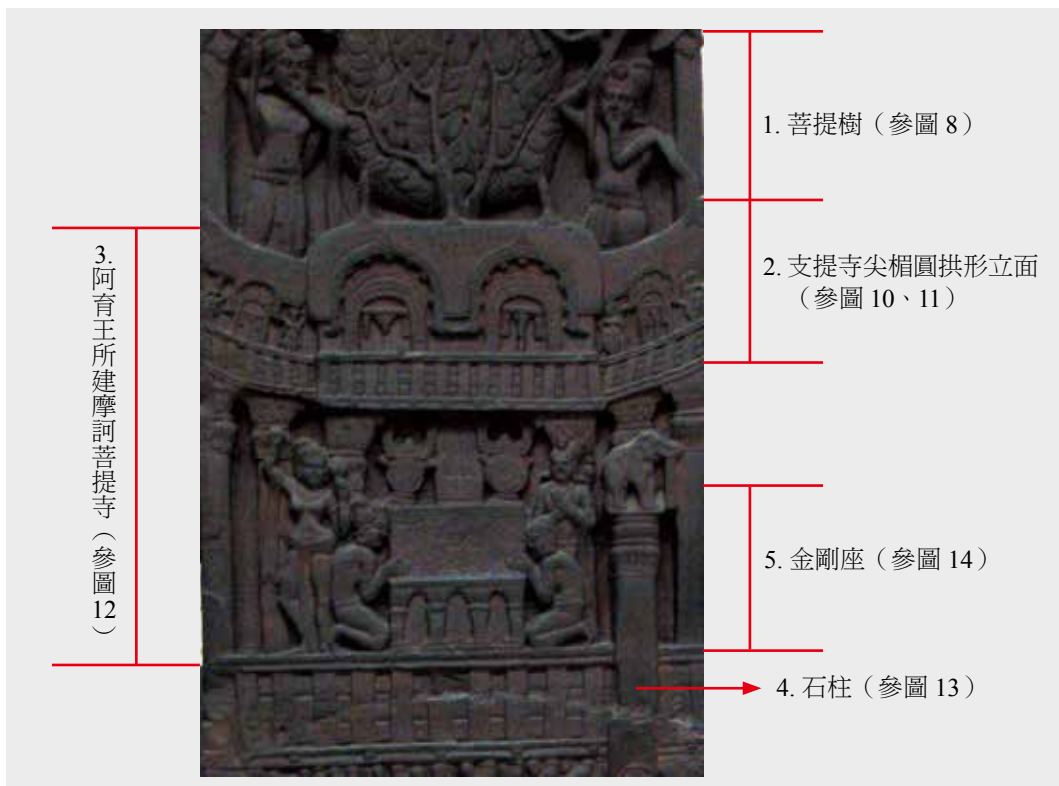


圖 9 | 約西元前150年巽加王朝時期所造Bharhut佛塔浮雕 2004年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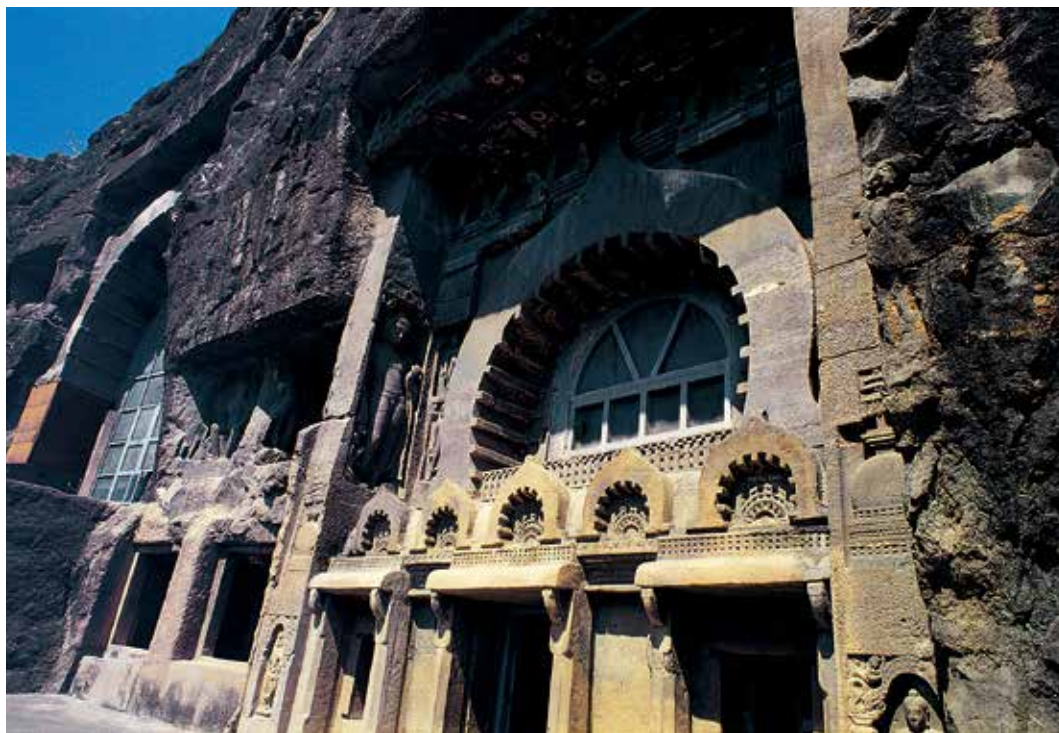


圖 10 | 西元前2世紀 印度阿姜塔石窟第九窟入口門上的支提造型 1998年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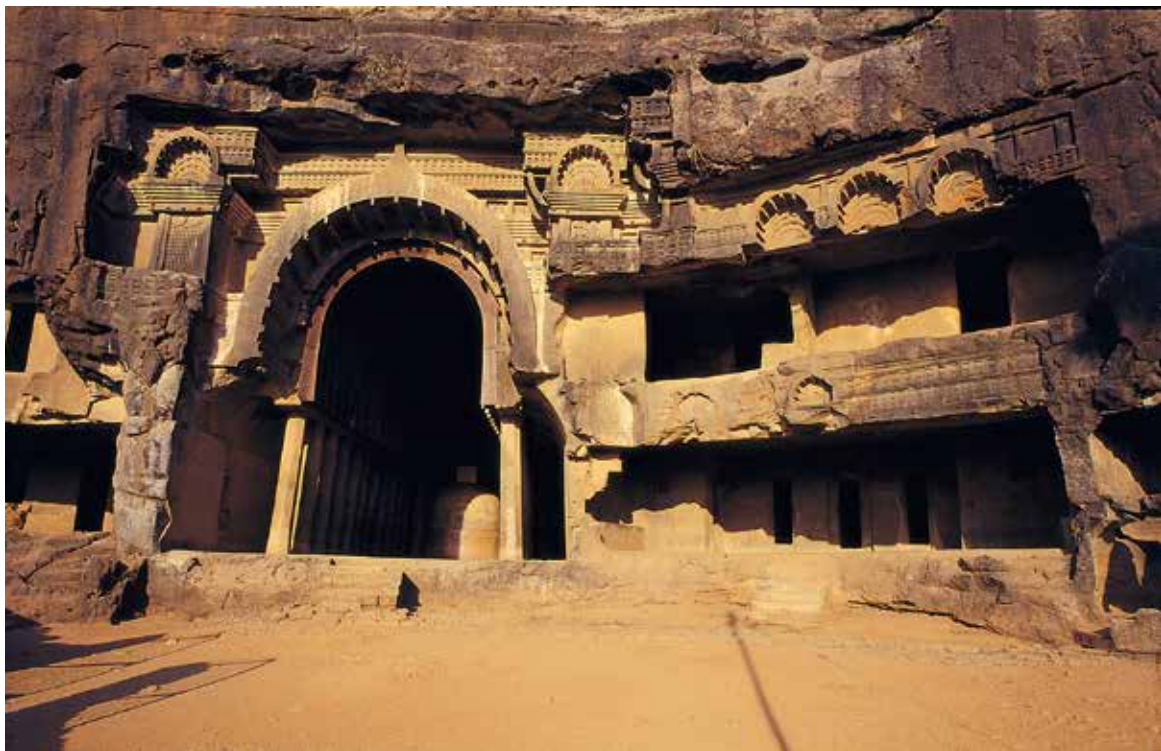


圖 11 | 西元前2世紀 印度Bhaja支提窟內以柱子營造出的右旋禮拜佛塔甬道 1998年作者攝

寺廟之外。現今印度菩提伽耶聖地中的菩提樹前方，介於菩提樹與摩訶菩提寺之間有一個金剛座，當筆者 2004 年造訪時，上面覆蓋住布幔，而不見原始的面貌。（圖 15）

摩訶菩提寺的建築風格與年代

現今所見的摩訶菩提寺為磚砌建築，採用印度廟宇建築的古典風格建造，高約 50 公尺，整座寺廟的基座平面是底部邊長為 15 公尺的正方形，四周以內有佛像的壁龕作為裝飾。（圖 16）入口朝東，其上為多層壁龕組成的牆面（圖 17），牆面之上是塔樓（shikhara），塔樓有印度寺廟傳統建築特徵的阿摩落迦果（amalaka）和 kalasha（圖 18）；阿摩落迦果的造型類似印度 amalok 水果的形狀，看起來像是一個齒輪，而 kalasha 位於寺廟頂端，類

似花瓶或水罐，⁷這和《大唐西域記》卷八的記載近似：「菩提樹東有精舍，高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甃，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果（亦謂寶瓶，又稱寶臺）。」摩訶菩提寺之所以呈現出印度廟宇建築的古典風格，這很可能與《大唐西域記》卷八記載：「精舍故地，無憂王先建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有關。亦即興建此佛寺者為婆羅門，而非佛教徒。所謂「無憂王先建小精舍」指的是阿育王在菩提伽耶建造的第一所佛寺，而所謂「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有一位婆羅門，本不信佛法，在大自在天的指引之下，為植善種，求福田，而建大精舍，其所建之大精舍應指早期磚砌建築之摩訶菩提寺。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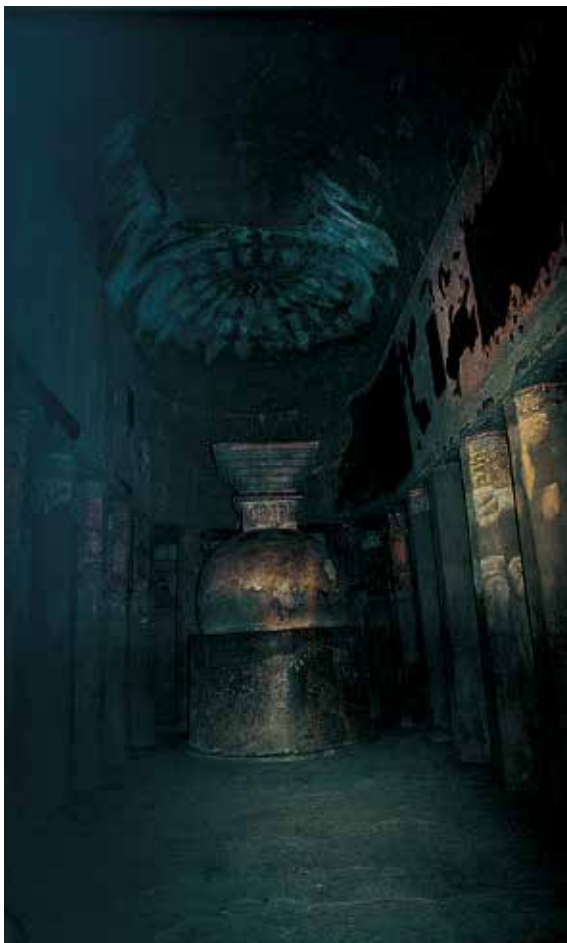


圖 12 | 西元前2世紀 阿姜塔石窟第九窟內部佛塔 1998年作者攝



圖 13 | 西元1~2世紀 印度Karla第八窟入口左前方石柱 1998年作者攝

這磚砌建築之摩訶菩提寺建於何時？一般而言，學界假定為介於西元二世紀到五世紀之間。⁹ 因為在摩訶菩提寺移除金剛座表層時，發現了貴霜王朝 Huvishka 王的金幣，其年代在西元 120 ~ 160 年之間。而在摩訶菩提寺石垣南門附近的一間小寺院內，發現一尊佛像，其底座上的銘文為西元 152 年。所有發掘的證據都顯示西元 152 年應該就是印度斯基泰王 Huvishka 委派 Tukamāla / Turamāla 建造摩訶菩提寺並安裝此佛像的年代。¹⁰ 此外，笈多 (Gupta) 王朝時期將圍繞



圖 14 | 1881年在菩提伽耶大菩提寺內發現的砂岩寶座 取自Cunninggham, Alexander. *Mahābodhi, or the Great Buddhist Temple under the Bodhi Tree at Buddha-Goya*, plate XIII.



圖 15 | 介於菩提樹與摩訶菩提寺之間，上面覆蓋住布幔的金剛座。 2004年作者攝



圖 16 | 摩訶菩提寺基座周圍飾以裝有佛像的壁龕 2004年作者攝

菩提樹與金剛座的石垣圍欄擴大，以便圍繞興建於菩提樹前方的一所大佛寺，在這佛寺之內，安放了一尊佛像於寶座上，以取代空置的金剛寶座。¹¹ 圖 19 所示為筆者於 2004 年參訪摩訶菩提寺時，寺內所安放的一尊坐於寶座上的釋迦牟尼佛像。摩訶菩提寺的入口

朝東，佛像面向正門，從戶外便可見此佛像。（圖 20）

雖然摩訶菩提寺歷經多次的維修整建，然而對摩訶菩提寺進行考古發掘研究的亞歷山大·坎寧安爵士以及印度考古學院 Debala Mitra 一致認為：玄奘於西元 637 年到訪摩訶



圖 17 | 菩提伽耶摩訶菩提寺 2004年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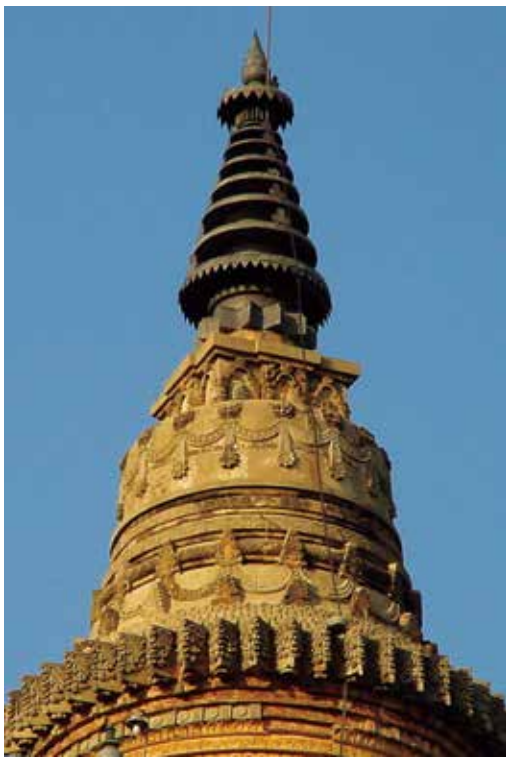


圖 18 | 菩提伽耶摩訶菩提寺塔頂 2004年作者攝



圖 19 | 摩訶菩提寺內所安置的釋迦牟尼佛像 2004年作者攝

菩提寺時所作的描述記載，與 1880 ~ 1881 維修前的摩訶菩提寺結構大體上相同。¹² 現今摩訶菩提寺牆面由多層壁龕組成的裝飾風格，對比現存印度建造於西元一至二世紀的 Karla 石窟，其前室右壁上下遍滿的裝飾，可以看到印度寺院建築的傳統。（圖 21）

摩訶菩提寺四隅所立的小塔，不見於西元前約 150 年的 Bharhut 佛塔浮雕上，這表示阿育王所建造最早的摩訶菩提寺周圍並沒有四座小塔。目前無法準確得知這四座小塔何時出現在印度菩提伽耶？但依據《大唐西域記》卷八記載：「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大窣堵波。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大正藏》，冊 51，頁 917，上 28 - 中 2）以及「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大正藏》，冊 51，頁 915，中 15）其中所謂的「窣堵波」，乃梵文 stūpa，佛塔之意。據此可知，當玄奘於西元 637 年巡禮摩訶菩提寺時，以石造闌珊圍繞金剛座與菩提樹而成的「菩提樹垣」，在四個角落各立有一座塔，那麼七世紀前的摩訶菩提寺建築形制應該接近所謂的「金剛寶座塔」了。

何以此一建築形制被名為「金剛寶座塔」？這與釋迦開悟時所在的「金剛座」有關，對「金剛座」的意涵，《大唐西域記》卷八有如下的解釋：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成，與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無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靜不傾。（《大正藏》，冊 51，頁 915，中 15-21）

這「證聖道所」即位於菩提樹下的金剛座，是朝聖的核心所在，因其象徵修學佛法的最高目的——開悟證菩提。



圖 20 | 摩訶菩提寺正門，從戶外可見此佛像。 2004年作者攝

摩訶菩提寺建築形制的傳播與演變

菩提伽耶是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朝拜聖地，摩訶菩提寺是印度佛寺中，最多來自世界各地佛教徒頂禮朝拜之寺，因此其建築形制也隨著佛教義理的流布，而傳播到其他國度。以下依尚存之實例略述摩訶菩提寺建築的傳播及演變。

(一) 南傳之例——緬甸蒲甘佛寺

自西元十一世紀起，摩訶菩提寺的維修與緬甸人關係密切，多件發現於菩提伽耶摩訶菩提寺內以緬甸文書寫的銘文證實，緬甸國王與僧人在十一世紀時對摩訶菩提寺進行了大規模的整修，例如：在一個鍍金銅製傘頂所發現 1035 年的銘刻顯示，緬甸國王委託 Dharma Raja Guru (法王師) 維修摩訶菩提寺，此鍍金銅製傘頂即此 Dharma Raja Guru 所贈。這項工程並沒完成，後來於 1071 年開始了另一次的全面整修工程，長達七年十個月之久，而於 1079 年結束。¹³ 此外，一則與執政於西元 1084-1112 / 13 年的緬甸蒲甘國王 Kyanzithā (亦稱為 Htilaingshin) 有關，編號第八的緬甸銘文記載了這位蒲甘王對菩提伽耶佛寺的贊助與維修：當國王得知菩提伽耶的佛寺倒塌成廢墟時，他便集合了眾多各種不同的珠寶，以船載運到印度，力圖興建一間比先前更加優美的聖寺。¹⁴ Kyanzithā 在位期間所興建的阿難陀寺 (Ananda Temple) 被視為緬甸最重要的一所佛寺 (圖 22)，其設計及建造者無疑都是印度人。¹⁵ 這所美麗的佛寺，其結構與摩訶菩提寺的形制有許多類似之處，例如：二者皆為內部供奉佛像的佛寺，寺廟的基座呈正方形，中央主塔寺與周邊四隅造型相同的四座塔造型相同，並共同建造於一個厚實的方型基座上。基於十一至十三

世紀間，緬甸人多次維修摩訶菩提寺，而蒲甘國王 Kyanzithā 又出資整修摩訶菩提寺，因此印度摩訶菩提寺建築形制的傳入緬甸，是很容易理解的。印度寺廟建築文化外傳之後，在當地常被內化而繼續發展。因此蒲甘阿難陀寺的整體造型，除了中央主塔寺與周邊四塔外，還有多層露臺，每一層的四隅又分建四塔，所有的塔立於一個方正高聳的建築物之上。然而在緬甸蒲甘地區有非常接近菩提伽耶樣式的佛塔建築，如圖 23 所示的三座佛塔。

(二) 北傳之例

建造於西元六世紀後半葉的敦煌莫高窟北周 428 窟，其西壁繪有類似金剛寶座塔形制的五塔 (圖 24)，¹⁶ 這種造型或許可以理解為從印度經西域傳入敦煌的早期摩訶菩提寺建築形制，在融入漢式建築風格後所形成。¹⁷ 值得注意的是：若將敦煌此例比對現今的印度摩訶菩提寺，以及十二世紀的緬甸蒲甘阿難陀寺，則發現三者都是佛寺，而非如同北京地區明清時期所建之金剛寶座塔為密閉式佛塔。另，北周 428 窟西壁上所繪五塔並沒有建造於共通的方正高臺上，那麼堅硬方正的高臺何時出現於印度摩訶菩提寺？這或許可從摩訶菩提寺在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淤泥掩埋，得到解釋。

根據亞歷山大·坎寧安爵士的考古研究與推測，大約西元五世紀中期，菩提伽耶旁的尼連禪河氾濫，河中之沙填滿寺廟達 2.5 英尺之高，當時寺內的金剛座被砂石掩埋。約西元七世紀初，菩提樹遭到異教徒砍伐，西元 620 年 Pūra Varma 王將菩提樹復原，並移高到積沙面上 25 英尺高之處，並將金剛寶座抬高到地面上 3.5 英尺高之處，此便是發現於 1881

年的金剛寶座。¹⁸ 這些基於尼連禪河的氾濫所做的搶救與維修，很可能便是現今所見摩訶菩提寺被建造於堅硬方正的高臺上，而形成名符其實的金剛寶座形制的歷史背景因素。莫高窟北周 428 窟建造於西元六世紀後半葉，年代上早於 Pūra Varma 王將金剛寶座抬高西元 620 年，亦即莫高窟北周 428 窟西壁所繪之五塔形式建築造型，可能是源自早期摩訶菩提寺的建築形制。

中國境內「金剛寶座塔」名稱的由來，在明劉侗等所著《帝京景物略》卷五中有較明確之描述：「成祖文皇帝時，西番板的達來送金佛五軀，金剛寶座規式，詔封大國師，賜金印，建寺居之。寺賜名真覺。成化九年，詔寺准中印度式，建寶座，累石臺五丈，藏級於壁，左右蝸旋而上，頂平為臺。列塔五，各二丈，塔刻梵像、梵字、梵寶、梵華。」



圖 21 西元 1~2 世紀 Karla 石窟前室右壁從上到下的裝飾
1998 年作者攝



圖 22 緬甸蒲甘 Kyauztada 王在位期間所興建的阿難陀寺 2007 年作者攝



圖 23 | 緬甸蒲甘地區三座接近菩提伽耶形制的佛塔 2007年作者攝

文中的「西番板的達」，應指來自西藏地區，深通五明的大學者，「板的達」即梵文（Paṇḍita）之音譯。

依照印度考古學院的研究，西藏朝聖者恰譯師·却傑貝（Chag lo-tsa-ba Chos-rje-dpal, 1197-1264，其梵文名字為 Dharmasvāmin），約於 1234 年朝訪菩提伽耶時，正值伊斯蘭教入侵，當時的菩提伽耶尚存十二所僧院，摩訶菩提寺為斯里蘭卡僧人掌管，他記載了當時摩訶菩提寺僧人的避難措施。¹⁹ 由此可推測摩訶菩提寺的建築形制很可能也被傳到西藏地區。

小結

「金剛寶座塔」的建築形制乃源自印度菩提伽耶摩訶菩提寺，而摩訶菩提寺的崇高



圖 24 | 敦煌莫高窟北周428窟西壁五塔 取自段文杰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428窟》，圖91。

意涵，源自釋迦摩尼佛開悟的「證聖道所」，菩提樹下的金剛座。從金剛座演變而來的「金剛寶座塔」，其象徵意涵是與修學佛法最高成就——開悟證菩提有關。

清淨化城塔前東、西兩側各有碑亭一座，東碑亭內的石碑上刻有乾隆帝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筆所書《清淨化城塔記》碑刻（見圖4），分別用漢文、藏文、滿文、蒙古文書寫，其中提及為六世班禪建塔緣由：「計自來觀至示寂，自示寂至還藏，屈指各及百日，

其間來去因緣不可思議，因命于寺之西偏，建清淨化城塔院，藏經咒衣履，志聖因也」。而塔記最後寫道：「舍利歸西天，于此建經幢。法嗣闡宗風，廣示正覺路。」²⁰ 這似乎表達了乾隆仿印度菩提伽耶摩訶菩提寺的「金剛寶座塔」建築形制來興建「班禪塔」的宗教信仰與思維，便是以代表釋迦摩尼佛開悟的「金剛寶座」建築形制象徵六世班禪已得正覺，並以此表達對六世班禪最高的敬意與緬懷。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註釋

1. 王堯，陳慶英，《西藏歷史文化辭典》（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8），頁4117。
2. 張連城等編著，《北京的佛寺與佛塔》（北京：光明日報，2004），頁81。
3. Mookerji, Radhakumud; Radhakumud Mookerji, *Asok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62), 18.
4. Alexander Cunningham, *Mahābodhi, or the Great Buddhist Temple under the Bodhi Tree at Buddha-Gaya* (London: W. H. Allen, 1892; Repr.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8), 22.
5. Alexander Cunningham, *Mahābodhi, or the Great Buddhist Temple under the Bodhi Tree at Buddha-Gaya*, vi, 2, 4.
6. Alexander Cunningham, *Mahābodhi, or the Great Buddhist Temple under the Bodhi Tree at Buddha-Gaya*, 1, 19; Rainer Knopf, "Bodhi-Gaya: Ein internationales Zentrum des Buddhismus in nicht-buddhistischer Umgebung," *Internationales Asienforum* 31, no.3-4 (2000), 292.
7. Wikipedia contributors, "Hindu temple architecture,"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accessed September 8, 2020,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Hindu_temple_architecture&oldid=975236879.
8. 以上《大唐西域記》卷8相關記載，請詳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大藏經刊行會出版，新文豐發行，1983），冊51，頁915、916。
9. Rainer Knopf, "Bodhi-Gaya: Ein internationales Zentrum des Buddhismus in nicht-buddhistischer Umgebung", 292.
10. Alexander Cunningham, *Mahābodhi, or the Great Buddhist Temple under the Bodhi Tree at Buddha-Gaya*, 20, 21.
11. 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Calcutta: Sahitya Samsad, 1980), 61.
12. 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62.
13. Alexander Cunningham, *Mahābodhi, or the Great Buddhist Temple under the Bodhi Tree at Buddha-Gaya*, p.viii.
14. Chas Duroiselle, *The Ananda Temple at Pagan,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56* (New Delhi,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1999), 6.
15. Chas Duroiselle, *The Ananda Temple at Pagan, Memoir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No.56*, 1,9.
16. 有關「金剛寶座塔」定名問題，請參考：施萍婷、賀世哲，〈進承中原·遠接西域〉，《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428窟》（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8），頁17-18。
17. 王敏慶，〈莫高窟428窟佛塔形制淵源考〉，《北周佛教美術研究——以長安造像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轉引自文博研習社：<http://www.wenbor.net/article/1753>（檢索日期：2020年10月22日）。
18. Alexander Cunningham, *Mahābodhi, or the Great Buddhist Temple under the Bodhi Tree at Buddha-Gaya*, vii, viii.
19. 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63-65.
20. 碑刻內文承蒙西黃寺西藏學者黎嘉才仁先生提供，於此謹致謝意。